

试论石家及遇村遗址性质与相关问题^{*}

杜博瑞¹ 王永安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 石家及遇村遗址, 演进, 周余民, 族群关系

摘要: 石家及遇村遗址是陇东地区首次发现的两周时期大型聚落。该遗址经历了单一墓地、城址功能完备、城址衰落三个阶段。根据墓葬特征可以看出, 该遗址一直以周文化为主导, 并在不同阶段与殷移民、西戎、秦等人群进行交往。春秋早期伊始, 该地区成为周余民人群的重要聚居地。基于此, 我们可以对陇县边家庄墓地族属与陇东地区周、秦、戎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认识。

KEYWORDS: Shijia-Yucun site, Transformation, Zhou remnants,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ABSTRACT: The Shijia-Yucun site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Zhou-Dynasty settlement discovered in eastern Gansu Province. Its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stinct phases: an initial stage as a cemetery, a subsequent transformation into a fully functional urban center, and a final phase marked by the town's declin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mbs and associated material culture, the Zhou cultural group appears to have been dominant, thoug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lso indicates interactions with Yin migrants, the Western Rong, the Qin, and other group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site exhibited featur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lture of the Zhou remnants. This discovery not only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regional dynamics during the Zhou period but also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Bianjiazhuang site in Longxian County and on the broader interactions among the Zhou, Qin, and Rong peoples in eastern Gansu.

石家及遇村遗址, 位于陇山东侧的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早胜镇遇村、西头村, 由石家墓地与遇村遗址两部分组成。该遗址20世纪60~80年代先后被发现, 201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家墓地进行了首次发掘。2018年, 因国家基本建设项目“银百高速”公路穿过遇村遗址区,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 对遇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通过几年的工作, 遗址的整体面貌越发清晰。到目前为止, 该遗址已公布了部分资料^[1], 具备了一定的讨论条件。

陇山东侧为周人的西北边疆, 该遗址是该地区首次发现的两周时期大型聚落, 这无疑对

探讨周人的发展、衰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 本文拟在现已公布材料的基础上对其性质等问题进行讨论, 不妥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一、遗址的演进

石家及遇村遗址分为城址区与墓葬区^[2], 截至目前, 面积共70余万平方米。墓葬分为高、中等级墓葬与低等级墓葬两区, 高、中等级墓葬位于城址外西南部, 即城西墓区; 低等级墓葬位于城址外西北、北部, 即城北墓区。城址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 南部被现代冲沟破坏, 由早期墓葬、壕沟、城墙、高等级建筑、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两周时期社会与思想变迁研究——一个案的视角”(编号: 2024QQJH05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甘肃石家及遇村遗址两周时期墓葬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编号: 23BKG008)的阶段性成果。

小型房址、道路、排水设施、祭祀坑、储藏坑、蓄水坑、窑址、灰坑、灰沟等遗迹单位组成。遗址年代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大致划

分为三个发展阶段^[3]，论述如下。

（一）第一阶段：西周早中期

该阶段为单一墓地，位于第二阶段形成的

城址内北部偏西。墓葬形制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葬式流行仰身直肢，部分墓葬存在圆形腰坑，但未殉狗，随葬品多为单件陶器，置于二层台上^[4]。目前已披露2座西周早期墓葬的材料。M5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长2.72、宽1.16~1.36、深2.68米。葬具为一棺，仰身直肢，中部有圆形腰坑，坑内无物；出土铜戈、铜衔镳、铜环、骨片、贝壳等（图一，1）^[5]。M20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长2.63、宽1.4~1.58、深4.25米。葬具为一槨一棺，仰身直肢，无腰坑；出土铜戈、玉戈等（图一，2）^[6]。该阶段在西周中期存在空墓的现象。

（二）第二阶段：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该阶段出现了城墙、壕沟、高等级建筑基址、排水设施、祭祀坑、储藏坑、灰坑、蓄水池等建筑设施（图二）^[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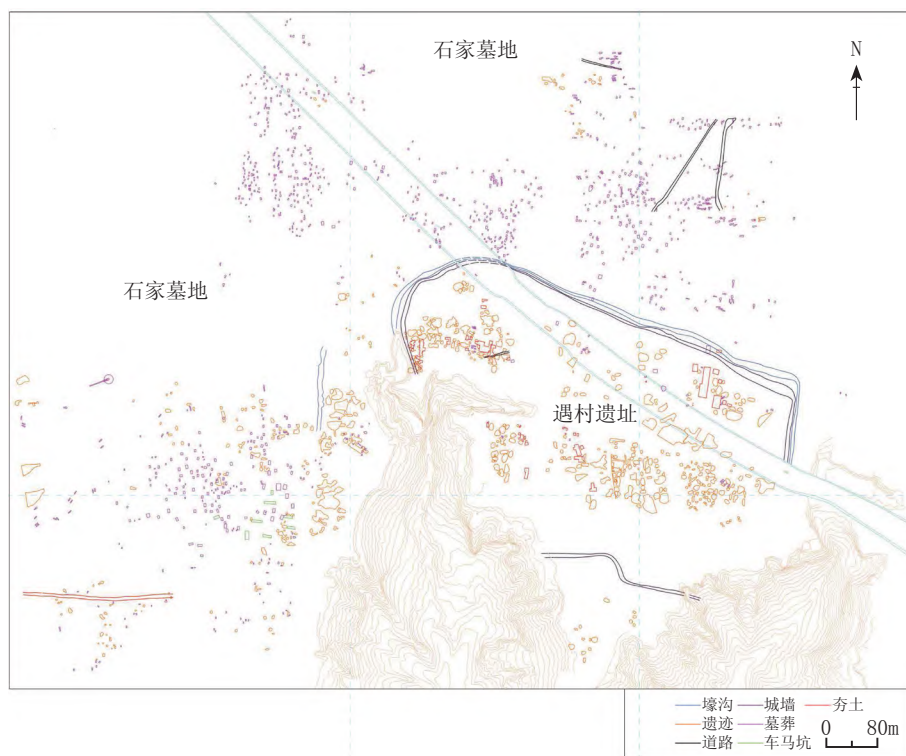
城墙呈上窄下宽的梯形，层层夯筑，夯窝密集但叠压打破关系少（图三，1）^[8]。城



1

2

图一 M5、M20 墓室全景
1. M5 2. M20



图二 石家及遇村遗址平面图

墙外有宽约6米的壕沟。高等级建筑位于城址内东北部，已探明的有9座，发掘了其中3座。例如F2，平面呈长方形，面上立柱，中心区域有祭祀坑，残存台阶3处，面积100余平方米；表面存在多处后期破坏的痕迹（图三，2）^[9]。普通居址位于城址内西北部，房址平面呈圆形或方形，形制以半地穴为主，兼有平地起建（图三，3）^[10]。房址周围发现有蓄水池、储藏坑等生活设施。此外，部分灰坑、灰沟、窑址等遗迹分布于城址中部偏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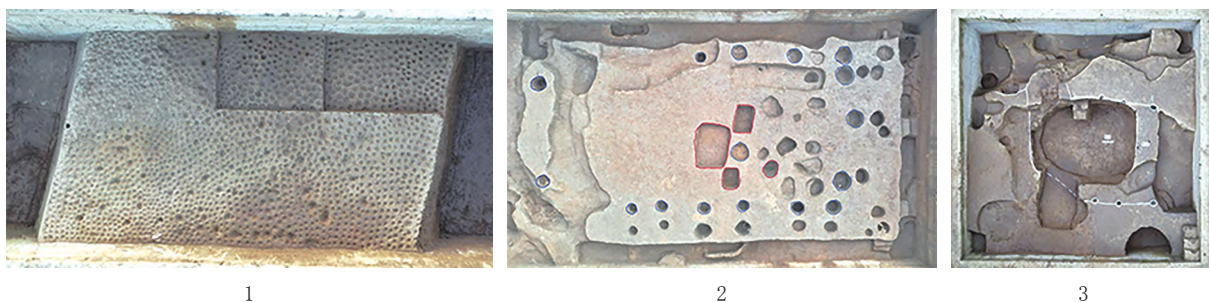
城址外部为墓葬区，西周晚期位于城址外北部，春秋早期高、中等级墓葬位于城址外西

南部，祔葬有车马坑；低等级墓葬集中分布在城址外西北部^[11]。从披露的墓葬来看，西周晚期墓葬皆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口小底大，墓内有生土二层台，葬具一椁一棺，构筑复杂。如M143，长3.8、宽2.5~2.6米；椁室有“目”字形棺架，棺架四角各有一根方形立柱；出土铜器、玉器、陶器、骨蚌器等（图四，1）^[12]。春秋早期墓葬多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口大底小或口小底大，墓内多有二层台，葬具有一椁一棺、一椁重棺等形式，构筑复杂。葬式有仰身直肢、侧身屈肢等。出土器类丰富，包含铜、金、陶、玉、石、骨、漆木器等（表一）^[13]。

表一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统计表

年代	墓号	尺寸(米)	墓向	棺槨	随葬品			
					铜器	石、玉器	漆器	金、陶、泥、骨蚌器
西周晚期	M143	3.8×2.5-2.6	南北	一椁一棺	鼎、簋、戈、铜柄铁剑、辖害、马衔、马镳、策首、削刀、带扣	玉：玦、琮、戈、人	/	陶：鬲 骨蚌：蚌泡、圆管骨饰
春秋早期	M257	5.91×3.8	南北	/	铃、鱼	石：磬形饰、圭、贝、璧、璜等 玉：环、玦、鱼、柄形器、玛瑙珠等	/	金：虎饰、带扣、环等 泥：珠
	M216	5.6×3.7		一椁重棺	鼎7、簋6、方壶2、盃1、盘1；微型鼎3、簋4、方壶3、盘2、甗1、匜1、盃1、鍤1等	石：圭、贝 玉：戈、圭、管、组玉串饰、玛瑙珠等	/	陶：罐2、磬形饰
	M4	5.51×3.6		一椁重棺	鼎4、簋5、盃2、盘3、壶5、銎铃2、铃8、鬲4	石：贝、圭、戈 玉：璜、璧、“凸”字形饰、玦、碎玉、管、耳形饰2、逗号形饰、馒头形饰、串饰、玛瑙、月牙形饰	匕、豆、盃、长方形器	陶：磬形饰 泥：鼎、簋、壶、珠、贝
	M6	5×3.2		一椁重棺	鼎2、簋2、壶、盃、盘、马甲	玉：玉饰11、佩5、管4、盒组件4、玛瑙珠3、玦2、璜2、项饰、佩饰、琮、盒	璧	陶：原始瓷 泥：盘、簋、壶
	M169	5.2×2.7		一椁单棺	鼎、簋、盘、盃、壶、车辖、剑	/	/	/
	M160	4.2×2.55		一棺	鼎2、簋、壶、盃、盘、铜柄铁剑、矛、戈、虎饰、泡2、衡末饰、兽面饰、节约2、辖害、马衔(镳)、策首、铃、龙形饰	/	/	泥：鼎、壶、盃、盘 骨蚌：轆饰、骨管、骨圭、骨小腰

注：由于资料所限，部分器物的数量暂不明朗，故表格中未列出具体数量。



图三 建筑遗存

1. 城墙 2. F2 高等级建筑 3. 半地穴房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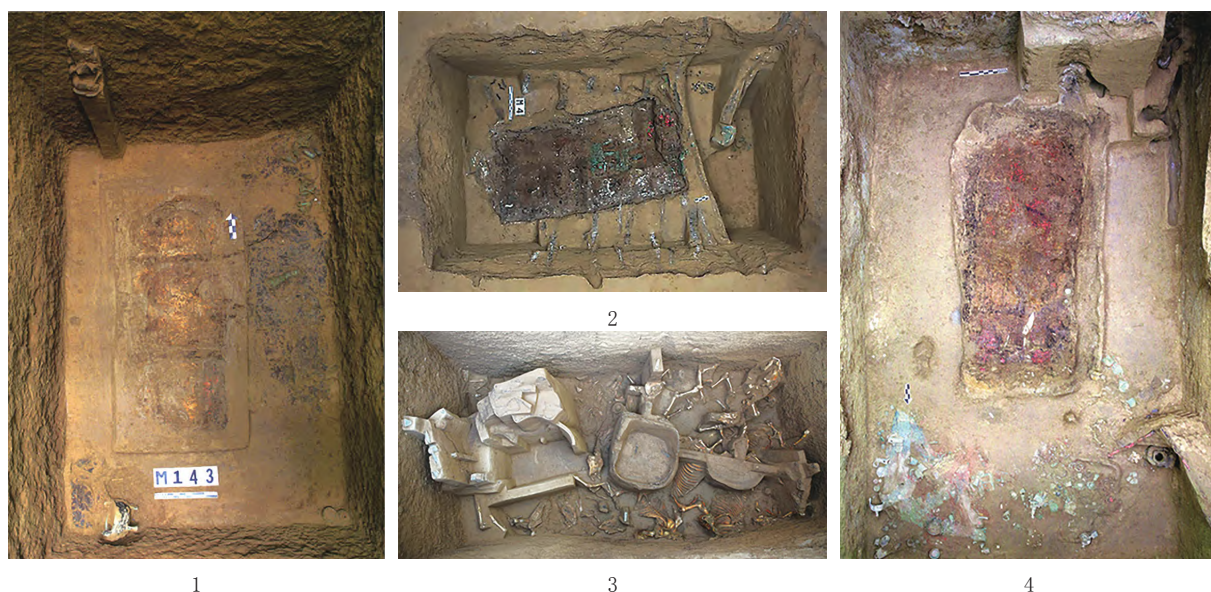
等级较高的如M4，长5.51、宽3.6米；葬具为一椁重棺，椁上覆席，棺四周和顶部置有铜翼、荒帷、池架、串饰等较为复杂的棺饰，棺内有红漆和“凸”字形玉饰；出土4鼎5簋在内的铜器、仿铜泥器、陶器、漆器、玉石器、蚌器等（图四，2）^[14]。等级更高的如M216，长5.6、宽3.7米；葬具为一椁重棺，椁上覆席，席下有“目”字形串饰，外棺顶部有红、黑颜料等；出土7鼎6簋在内的铜、陶、玉、石器等（图四，4）^[15]。此外也有特殊情况的墓葬，如M257墓室经过扰乱。出土铜车马器、金虎饰、金带扣、石璧、石璜、石柄形器以及牛、马、狗等骨骼，分布散乱无规律，可能在当时就遭到了破坏^[16]。此外，等级较低的墓葬有墓内葬车的发现，如M160，长4.2、宽2.55米；葬具为

一棺，棺上有棺架，棺架周围散落有棺饰，棺架顶部殉车一辆，车为拆车，无车轮^[17]。

墓葬区的车马坑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如MK2，车马分层放置；殉车1~2辆，为拆装，马分2层共30匹，车、马分层放置，葬式散乱（图四，3）^[18]。

（三）第三阶段：春秋中晚期

城址遭受大规模破坏，但仍有遗迹存在，且城址第③层地层堆积时代为春秋中晚期。城址外墓葬区在春秋中期继续沿用，高、中等级墓葬仍位于城址外西南部，低等级墓葬位于城址外西北部（表二）^[19]。其中，高等级墓葬如M218，南北向竖穴土坑墓，祔葬车马坑^[20]。中等级墓葬如M35，南北向竖穴土坑墓，一椁重棺，葬式为侧身屈肢，棺周围有磬形饰、珠等



图四 M143、M4、M216 及 MK2

1. M143 墓室全景 2. M4 墓室全景 3. MK2 4. M216 墓室全景

表二 春秋中期墓葬统计表

墓号	尺寸 (米)	墓向	棺槨	随葬品					
				铜器	泥、陶器	玉、石器	漆器	骨器	其它
M218	6×4	南北	一椁重棺	鼎7、簋8、甗、鬲、方壶2、盘、匜、盂、虎形饰16、龙形饰4、婴、戈、钺、策首等	罐5	石：圭、戈、贝、磬形饰	簋	骨饰	金虎
M30	6×3.8		一椁一棺	鼎3、婴2、婴角4、车𦍋2、衡末饰、马衔(骨镡)2、铃8、“T”形饰	泥：贝33 陶：磬形饰183、盆2、罐	玉：饰件3 石：圭、斧	/	鐙	蚌泡4、绿松石块2
M38	5.6×3.7		一椁重棺	镬鼎、列鼎7、簋6、盆、鼎式鍑、盘、婴角7、铃6、铃舌2、“U”形饰、鱼40	泥：泥珠若干 陶：鬲2、罐、盆、豆	玉：玛瑙珠16、觚、管状饰、贝、饰件 石：圭4、斧、珠16、贝270、磬形饰65	方形器	鐙、小短剑	费昂斯珠19、海贝5、蚌刀
M35	5.3×3.5		一椁重棺	鼎6、盆、婴、婴角4、马甲片2、环4、铃2、矛2、戈4、剑、马衔(镡)2、马衔4、泡7、短剑、镞、铎等	泥：贝12 陶：豆、簋、器盖、球、圭6、磬形饰84、珠146	玉：饰件2 石：刀4、饼形器2、纺轮、斧	/	小腰2、泡2、环、管3	蚌泡5
M166	5.1×2.9		一椁重棺	/	泥：鼎3 陶：鼎足	石：圭、柄形器	簋、俎、盾	/	皮甲冑、木俑
M167	4.4×3		一椁重棺	鼎、舟、镜、剑、戈、刀	/	/	/	/	/
M32	1.8×1		一棺	戈	/	石：圭5	/	/	/

注：由于资料所限，部分器物的数量暂不明朗，故表格中未列出具体数量。

组成的较复杂棺饰；墓内出土包含6鼎在内的铜、石、陶、骨、玉器等^[21]。M38，南北向竖穴土坑墓，一椁重棺，尸骨被盗不存，棺周有磬形饰、珠、贝组成的棺饰；墓内出土包含1镬鼎、7鼎6簋在内的铜、石、陶、漆、骨、玉器等^[22]。M166，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1、东西宽2.9米；葬具为一椁重棺，墓内存在荒帷，棺有东西向13道、南北向5道“棺束”；葬式为仰身直肢，出土包含3泥鼎在内的泥、陶、石、漆、木、皮革等器物（图五，1、2）^[23]。

车马坑MK3、MK5皆为东西向竖穴土坑，车马作驾乘状，均殉狗。其中，MK3内殉车1辆，为1车2马；车为单辕，辕东舆西，车内放置铜𦍋等器物。MK5内殉车5辆，第1辆车无马，第2～5辆车皆为1车2马，且车下发现有殉

人现象；殉人为单棺，屈肢葬，年龄为25～30岁之间的成年男性；车均为单辕，辕朝东，车内放置马络饰及铜婴等器物（图五，3）^[24]。

春秋晚期，城址内暂未发现任何遗迹现象，墓葬区高、中等级墓葬与车马坑皆不见，仅见低等级墓葬及平民墓葬。文化因素包含周、秦、戎这几种文化^[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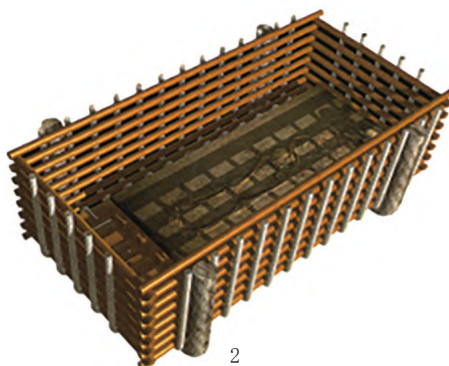
二、遗址的性质

石家及遇村遗址经过了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发展与文化构成存在一定区别，分析如下。

第一阶段，城址未兴建时期。该时期仅发现东西向墓葬，墓葬分为有腰坑与无腰坑



1



2



3

图五 M166、MK5

1. M166 墓室全景 2. M166 棺束复原图 3. MK5

两类。其中有腰坑的M5出土2件形制相似的铜戈，典型特征为前鋒残缺，与周文化的毁兵习俗相似^[26]。此外，M5:5铜戈内部靠近阑侧铸铭“𠄎”，该铭文与商代晚期武安赵窑M10出土的鼎、爵上的铭文一致^[27]。另一方面，M20为东西向，无腰坑，出土的铜戈形制为直援、无脊、上下阑、阑侧一穿、直内、内上有一圆形穿，此种形制的铜戈与M5出土的铜戈存在区别。有学者认为西周王朝的西北边疆存在部分东西向带头龕墓、偏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此类墓葬可能与姬姜同盟有关^[28]。由此看来，第一阶段至少存在两类人群，一类为武安一带迁来的殷遗民，另一类为姬姜同盟。此外，该阶段在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墓葬空置现象，存在人群迁出此地的可能。

第二阶段，城址兴建、兴盛时期。该时期

城墙、壕沟及东北区域的高等级建筑、西部的普通居址和中部偏北的灰坑、窑址皆展示了一个城址较为完备的功能和布局。两周之际城址内外墓葬的发现到春秋早期城址外墓葬的分区，也是城址规划逐渐走向完善的体现。

城址的资料暂未公布，从公布的墓葬材料来看，M4等墓内较为复杂的串饰以及荒帷等是周代丧葬仪式的主要器物^[29]，与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墓葬形式较为相似^[30]。墓内出土的铜罍，不仅是周代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物，也是周代封国和王室重臣的主要使用器物（图六，1）^[31]。此外，M216出土

的铜鼎双立耳、折沿、垂腹、蹄足，上腹部与足部置扉棱，腹部饰窃曲纹与山纹，足部饰兽面纹等特点是继承西周晚期铜鼎的形制，属于周文化系统（图六，2）^[32]。同时，M216出土铜匚（图六，3）^[33]、M257出土金虎饰（图六，4）^[34]等皆为北方草原较常见的器物，体现了该阶段北方因素与周文化因素的共存。

第三阶段，城址衰败时期。该时期城址遭受大规模破坏，但仍有遗迹存在，且城址第③层堆积时代为春秋中晚期。从公布的零星墓葬材料来看，其仍以南北向竖穴土坑墓为主，棺饰开始简化。M218随葬7鼎8簋，表明该时期仍然存在高等级墓葬。M166出土器物虽较少，但墓内棺床、棺束较为复杂，依旧显示出墓主具有较高等级。《礼记·丧大记》曰：“君盖用漆，三衽三束。大夫盖用漆，二衽二束。

士盖不用漆，二衽二束。”^[35]M166棺束虽有僭越，但形制仍是周文化礼仪的沿用。此外，M38出土的鼎式鍍展示出中原与北方草原文化的融合（图六，5）^[36]，足部带箍棱的鼎也是较为典型的秦式风格器物（图六，6）^[37]。M35出土的短剑（图六，8）、铜盂（图六，7）^[38]则具有浓郁的秦式风格。车马坑方向在春秋中期转

为东西向，与秦人车马坑葬俗存在相似性^[39]。第二阶段所见的戎式风格器物减少，秦人与戎人势力开始转换。

综上所述，石家及遇村遗址三个发展阶段中，第一阶段的墓葬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部分墓葬带有圆形腰坑，随葬器物多为单件陶器，人群为开始周化的殷遗民与姬姜同盟。第二、三阶段的共同特征是墓葬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一椁重棺，墓内随葬铜罍，存在复杂的串饰、荒帷等棺饰。人群主体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为周文化人群。此外，根据上文对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到有7鼎8簋、7鼎6簋、4鼎5簋等不同的鼎、簋组合，通过有关学者对鼎、簋制度的研究^[40]，可知一直到春秋中期，该地的周文化人群都为大夫、士等阶层。西周末年，由于太子的废立，周幽王与西部部族关系十分紧张。

《史记·周本纪》记载：“申侯怒，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虜褒姒，尽取周赂而去。”^[41]戎人的入侵导致周王畿被破坏殆尽，平王只能在秦、晋等国的护送下东迁。此地落入戎人之手，秦人开启了伐戎继周的征程。该遗址自西周晚期以来，一直是周文化占据主体，兼有戎式、秦式因素。

《史记·秦本纪》记载：“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



图六 石家及遇村遗址出土器物

1. 铜罍（M4） 2、6. 铜鼎（M216、M38） 3. 铜鍍（M216） 4. 金虎饰（M257）
5. 鼎式铜鍍（M38） 7. 铜盂（M35） 8. 铜短剑（M35）

岐，岐以东献之周。”^[42]有学者认为“余民”称谓，通常是指灭国之后或者说亡国之后的民众。而秦文公事迹所见的“周余民”，只是脱离了周王朝直接的行政控制，散落于原本为周的重心区域——关中地方的民众^[43]。据此，或可认为平王东迁洛邑后，滞留关中及其以西的周文化普通民众和贵族皆为“周余民”。石家及遇村遗址地处西周时期周人的西北边疆，平王东迁洛邑后，该地墓葬的构筑、随葬器物仍保持着周文化的内涵，说明在西周晚期以后，仍有受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民众在此生活。因此，该遗址的人群自西周晚期以后为“周余民”应是无疑的。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陇县边家庄墓地人群族属再认识

陇山东西两侧位于周人的西北边疆，平王东迁后这里成为秦人崛起之地。原有周余民的遗存被纳入了秦文化范畴，造成了文化认定上的混淆。陇县边家庄墓地位于陇县千河西南岸台地上，1929~1989年先后发掘墓葬33座^[44]，出土鼎、簋、甗、方壶、车马、铃、鱼等铜、陶、玉、石、骨器^[45]。该墓地自发现以来，通过出土器物与大堡子山、圆顶山秦墓器物的对比研究，认为其亦为秦文化墓地，并提出了

“边家庄模式”^[46]。然而,石家及遇村遗址所辨识出周余民的文化特点为陇县边家庄墓地人群族属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可能,讨论如下。

陇县边家庄墓地完整公布了M1、M5这两座墓葬的材料。M1为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一椁一棺,出土5鼎4簋以及镬鼎、壶、盘、盂、甗、矛、戈、车𠂔、铃、环、管、石贝等铜、石器。虽然墓葬经过破坏,但出土的126枚石贝仍旧表明了棺饰的存在。M5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长5.2、宽3.5米,墓内除足端外皆有二层台。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室周身置罍,并悬挂铜鱼、陶磬、陶珠、贝等串饰,棺有彩绘。葬式为仰身直肢。墓内随葬5鼎4簋等青铜礼器,以及车马器、陶、石器,年代为春秋早期。从墓葬构筑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出土器物有棺饰等特点来看,该墓与石家及遇村遗址M4等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此外,M5椁内置车,这在西周早期的张家坡墓地中较为常见,但不同之处在于张家坡墓地墓内置车多为将车拆散后随葬^[47]。这或许体现了葬俗的发展。

有学者对秦文化的葬俗进行总结:墓葬东西向、有腰坑、殉人、壁龛^[48]。陇县边家庄墓地南北向、仰身直肢、墓内葬车、置罍、存在棺饰的特点与秦文化墓葬不同,而与石家及遇村遗址墓葬具有相似性,为周余民的葬制特点。因此,陇县边家庄墓地部分墓葬墓主应为周余民。

(二) 陇东地区两周时期周、秦、戎关系

该遗址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的演进历程勾勒了周人在西北边疆不同时期与殷遗民、戎人、秦人的交往过程,成为窥探陇东地区两周时期周、秦、戎关系的窗口。试析如下。

西周早中期,墓葬所展示出的殷遗民与姬姜同盟与当时的形势密不可分。西周初年,周人大破大邑商,迁部分殷遗民来镇守周人的西北边疆。至西周中期以后,由于周人与玁狁等戎人的关系较为紧张,周人的势力在此地迅速收缩。有学者通过对泾河中上游地区墓葬、聚落等的梳理,总结出该地区西周早期前后出现高、低等级有序的殷遗民墓葬,此类人群为周

人镇守边疆、拱卫王都、服务王室提供了坚实的力量^[49]。此外,姜姓族群与周人关系较为密切,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来胥宇”^[50]的描写就是周人通过联姻与姜姓族群组成联盟的写照。故而,殷遗民与姬姜同盟在该时期一并成为拱卫王室的重要力量。

西周晚期,周人与西方部族玁狁的战争趋于激烈,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铜器所铸铭文皆有记录。至幽王废立太子事件,申侯联合缙、玁狁等部族,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下,从而夺取周地泾阳、岐丰等地^[51],造成“玁狁蠢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52]的动荡现象。平王东迁后将此地赐予秦人,允诺“能攻逐戎,即有其地”^[53]。故而,周人与戎人的关系似乎较为紧张。石家及遇村遗址则展示了不同的景象,遗址在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墓葬表现出周文化与西戎文化结合的姿态,城址也是在该时期建立并完善的。此外,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合水九站遗址内周文化和寺洼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共存,且周文化比例随时代发展逐渐升高^[54]。宁县谢家宇村西周晚期墓葬中,铜鬲、盥、尊等周文化因素与铜虎等西戎文化共存^[55]。由此观之,西北边疆地区周人与戎人的关系与周王畿地区的周、戎关系并不完全相同。

平王东迁后,秦人开始了伐戎继周的征程。《史记·秦本纪》记载文公时,“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56]。穆公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57]。秦人后方逐渐稳定,然而来自陇东地区的义渠国威胁仍未消除,直至秦惠文君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58],其威胁才渐趋减小。石家及遇村遗址自春秋中期以来,表现出城址衰落、秦文化因素迅速扩张、西戎文化逐步消退的特征。有学者认为此类现象是秦文化确立期间,部分地方原住民贵族进入秦人的统治集团,为秦人所用而导致的^[59]。因此,我们认为石家及遇村遗址的周余民亦是在保有自身文化的基础

上,为秦人所用,并在物质层面展现出一定的臣服性。同时,春秋时期秦人墓葬仅在灵台地区景家庄^[60]、洞山^[61]发现,石家及遇村遗址成为春秋时期秦人挺进的最北端。一般认为义渠国位于宁县^[62],石家及遇村遗址春秋中期以后迅速衰落,且不见战国时期遗存,应与义渠国的强大,秦人退守平凉一线有关。由此来看,随着秦人的发展,周余民逐渐被其吸收,而戎人与秦人的对立更加尖锐。

通过文献的梳理,以及该遗址人群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到两周时期殷人为周人所用,戎人与周人在边疆的相处较为和谐。《史记·周本纪》记载的“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闲”^[63]也是西北边疆周人与戎人和谐关系的一种早期写照。平王东迁之后,周余民逐渐融入秦人,成为秦人发展过程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而秦人伐戎、与义渠国等的对抗,表明了秦人与戎人关系的对立。

四、结语

石家及遇村遗址经过了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展现了单一墓地、城址功能完备、城址衰落的过程。该过程展示出周、秦、戎不同族群之间对立、融合的复杂关系。遗址所展现的周文化内涵不仅为寻找春秋时期的周余民提供了参照,还展示出平王东迁后,周余民与戎人筑城自保,但最终仍然摆脱不了迅速被秦人兼并的命运。诚然,遗址内诸多细节仍不明朗,有待于更多资料的公布。但不可否认的是,石家及遇村遗址的发现,为探讨周文化统治格局在西土的演进,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附记:本文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得到水涛、张天恩、徐良高几位老师的指导,评审老师也提出了较好的修改意见,在此致谢!

- [1] a. 王永安,张俊民. 甘肃宁县石家墓群发掘5座春秋高等级墓葬[N]. 中国文物报, 2017-11-17(8). b. 周静,等. 甘肃宁县石家墓群·遇村遗址发现学术研讨座谈会综述[N]. 中国文物报, 2018-11-2(6). c. 王永安,张俊民,等. 宁县石家东周时期墓群[C]//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472-473. d. 王永安. 甘肃宁县石家墓群秦式短剑[J]. 大众考古, 2018(6). e. 王永安. 宁县石家墓群的发现与发掘[J]. 大众考古, 2018(9). f. 杜博瑞,等. 甘肃宁县遇村遗址2018年发掘收获[J]. 大众考古, 2019(4). g. 王永安,孙锋. 甘肃宁县石家墓地2018年考古调查[J]. 大众考古, 2019(6). h. 王永安. 泾水悠悠话幽风——甘肃宁县石家墓地2018年考古发现与收获[J]. 大众考古, 2019(9). i. 王永安,张俊民,等. 宁县石家东周时期墓群[C]//中国考古学年鉴2018,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j. 王永安,孙锋,杜博瑞. 交流、变迁与融合——甘肃宁县石家及遇村遗址考古新发现[N]. 中国文物报, 2020-9-4(8). k.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宁县石家墓地M4、M166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20(5). l.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石家墓地·遇村遗址. 甘肃重要考古发现(2000-2019)[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20:276-295. m.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宁县石家东周墓地2016年的发掘[J]. 考古学报, 2021(3). n.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甘肃宁县遇村遗址西周墓(M5、M20)发掘简报[J]. 文物, 2021(10). o.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陇原西周:甘肃宁县石家墓地出土文物集萃[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24.
- [2] 城址区即遇村遗址,墓葬区即石家墓地与遇村村址区外北部区域。
- [3] 相关披露的资料显示,遇村遗址的分期为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三期;石家墓地的分期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三期。综合城址和墓地的分期,我们可以发现春秋晚期遗物主要在地层内发现,因而春秋中期为城址的最后阶段,即可以将春秋中晚期整合为一段。故整体可以整合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西周早中期,第二阶段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第三阶段春秋中晚期。详见[1]j.
- [4] a. 同[1]f. b. 同[1]j.
- [5] 同[1]n. 图五.
- [6] 同[1]n. 图七.
- [7] a. 同[1]o:前言图二. b. 同[1]f. c. 同[1]j.
- [8] a. 同[1]l:图一七. b. 同[1]j.
- [9] a. 同[1]l:图一八. b. 同[1]j.
- [10] 同[1]j:遇村遗址Ⅱ区F1图.
- [11] a. 同[1]l. b. 同[1]o. 此外,从相关资料来看,两周之际的墓葬位于城址内,但未有材料公布,暂不叙述。
- [12] 同[1]o:30图.
- [13] a. 同[1]o:45-274. b. 同[1]:a. c. 同[1]:e. d. 同[1]:h. e. 同[1]:j. f. 同[1]:k. g. 同[1]:m.
- [14] 同[1]k:图三.
- [15] a. 同[1]o:46图. b. 同[1]:e.
- [16] 同[1]a.
- [17] 同[1]o:120.

- [18]同[1]h:MK2出土车马全景图。
- [19]同[1]o:169-235。
- [20]同[1]a。
- [21]a.同[1]d.b.同[1]l。
- [22]同[1]l。
- [23]a.同[1]k:图四五。b.同[1]o:前言图一〇。
- [24]a.同[1]l:图一五。b.同[1]h。
- [25]同[1]j。
- [26]a.张明东.略论商周墓葬的毁兵葬俗[J].中国历史文物,2005(4)。b.井中伟.西周墓中“毁兵”葬俗的考古学观察[J].考古与文物,2006(4)。
- [27]a.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文化学院.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2(3)。b.杜博瑞.宁县遇村M5出土青铜戈及相关问题[J].文博,2023(3)。
- [28]刘静.西周王朝西北边缘地带考古学文化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2:206-208。
- [29]a.张长寿.墙柳与荒帷[J].文物,1992(4)。b.张天恩.周代棺饰与铜簠浅识[C]//考古学研究(八).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 [3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32,70。
- [31]a.同[29]b。b.胡均璠.两周铜簠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9:56-58。c.同[1]k:图二六。
- [32]a.路国权.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4:288。b.同[1]o:51图。
- [33]同[1]o:61图。
- [34]同[1]j:石家墓地南区M257金虎饰图。
- [35]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丧大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80。
- [36]同[1]m:图版肆,4。
- [37]同[1]m:图版贰,1。
- [38]a.张天恩.秦器三论[J].文物,1993(10)。b.张天恩.再论秦式短剑[J].考古,1995(9)。c.同[1]d。
- [39]刘婷,梁云.秦人车马殉葬方式及其渊源[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伍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40]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C]//高明学术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41]司马迁撰.史记·周本纪(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
- [42]司马迁撰.史记·秦本纪(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9。
- [43]王子今.秦强国扩张的重要政策:“收周余民而有之”[J].人文杂志,2021(1)。
- [44]a.肖琦.陕西陇县边家庄出土春秋铜器[J].文博,1989(3)。b.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J].文博,1990(5)。
- [45]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8(11)。b.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J].考古与文物,1986(6)。
- [46]a.同[44]b。b.张天恩.早期秦文化特征形成的初步考察[C]//周秦文化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16-227。
-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333。
- [48]梁云.早期秦文化的来源与形成[J].考古学报,2017(2)。
- [49]a.同[28]:203~205。b.张博.试论陇东之于周人——建立在墓葬视角上的微观分析与宏观比较[J].文博,2013(4)。
- [5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84。
- [51]彭裕商.周伐玁狁及相关问题[J].历史研究,2004(3)。
- [52]同[50]:1257。
- [53]同[42]。
- [54]王占奎.试论九站寺洼文化遗址——兼论甘肃东部寺洼文化[D].北京:北京大学,1985:52。
- [55]a.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庆阳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考古与文物,1983(3)。b.许俊臣,刘得祯.甘肃宁县宇村出土西周铜器[J].考古,1985(4)。
- [56]同[42]。
- [57]同[42]:194。
- [58]同[42]:206。
- [59]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74。
- [60]刘得祯,朱建唐.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墓[J].考古,1981(4)。
- [61]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J].考古,1976(1)。
- [62]汪受宽.义渠戎历史钩沉[J].甘肃社会科学,2017(1)。
- [63]同[41]:112。

(责任编辑 牛海茹)